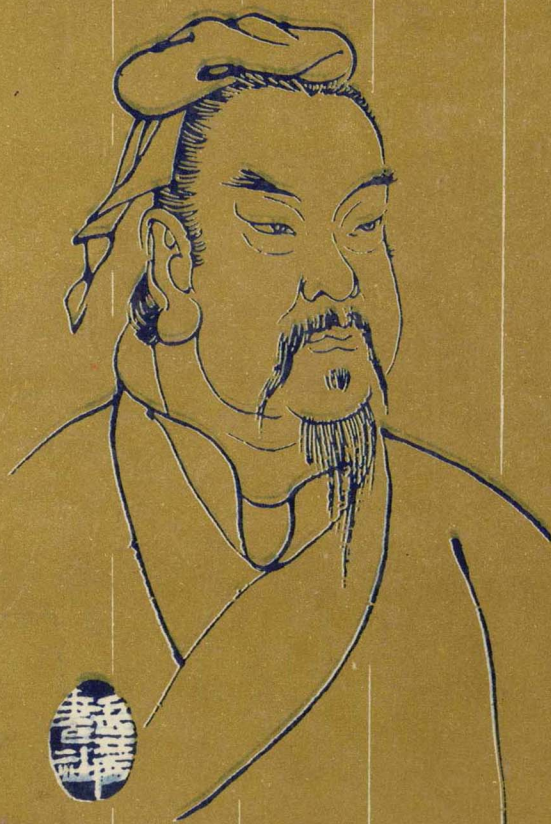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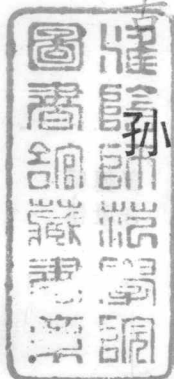


孙子兵法集注



古典名著普及文库



孙子兵法集注

曹一操 / 梅尧臣 / 等注
黄朴民 / 赵海军 / 点校



岳麓书社
1995 / 长沙



518396



责任编辑 曾德明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孙子兵法集注

黄朴民 赵海军 校点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青山印刷厂印刷

199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280,000 印张:11.75 印数:1—15,000

ISBN7-807-2-5/ E·P

定价:(精)13元 (平)10元

湘新登字007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(厂址:宁乡原煤炭坝车站 邮编:410609)

人其先將下韓五張對同定對直出《時春刊目》、《策國始》。”文

、田登兩冊下張除，并立為概式，新量韓五《五史》干至。事其

。主政聯聯景辭其，屯圖王吳見世者吳“篇三十”以辭言即并

，謝不景著土并景目孫公外

序

升田亦并一《去吳千概》言以

的《史即》、《史宋》、《并書豫》、《并乃》中并史。的有言并游景

景目。景著言與善《志辭登》的《并書印》、《并辭》麻《志文芝》

并對奇補》為公景、《目并堂時數》素武、《景子》辭率詞中并

四

《孫子兵法》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之

一，是闡述指導戰爭的普遍規律的兵書。其軍事思想對後世

影響深遠，歷代兵家奉之為主臬。同時，《孫子兵法》還是一部

出色的哲學著作，對中華民族乃至東方人的思想和思維方式

有着深刻的影響。今天在多種學科中有其深邃思想的顯現，

各行各業的人群中其警句脫口而出。《孫子兵法》的思想影響

遠遠超出了軍事範疇，超出了中國這塊土地，超越了時空的界

限。它是中華民族貢獻給全人類的瑰寶，是世界人民的共同

財富。并乃》見”。案五十三善寶，用要煩，案二十八百此，去

題”《孫子兵法》一書是春秋時期著名的大軍事家孫武所著。

孫武是齊國人，祖上為齊王攬甲征戰者代有人才。孫武在青

少年時代受到齊國兵學的陶冶，及長齊國內亂，南下求仕。後

在吳國為將軍，吳王用他和伍子胥的謀略“西破強楚，北威齊

晉，南服越人”（見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），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戰

績，使吳國得以稱霸。孫武繼承了齊國的兵學傳統，經歷過戰

爭實踐，將其經驗教訓升華，創作出《孫子兵法》這一光輝的理

論著作。此書所闡述的戰略思想和戰爭的普遍規律，對後世

的戰爭具有指導意義。所以在成書不久的戰國時代即已流傳

了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記載：“境內皆言兵，藏孫、吳之書者家有

之”。《战国策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也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孙武其人其事。至于《史记》记载最详，为孙武立传，叙述了他的经历，并明言他以“十三篇”兵法进见吴王阖庐，其情景栩栩如生。以后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在历代史书及公私目录书上著录不断，是流传有序的。史书中《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宋史》、《明史》的《艺文志》和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的《经籍志》等均有著录。目录书中阮孝绪《七录》、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等尽皆著录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源远流长，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，历经文字的演变、版本的进步、注释的繁富等种种变化。从中可以看出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受到历代王朝和人们的重视，普及范围和研究程度在不断扩大和深化，显示出经久不衰的活力。两汉时期出现了规范化的定本和第一个注释本。汉初，战争甫定，百废待兴，收集兵书为要务之一。其时，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。”（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汉武帝时，“军正杨仆捃摭遗逸，纪奏兵录，犹未能备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捃摭，谓拾取之。”这两次整理兵书重在收集，使得战乱残存和流失的兵书得以保存下来，《孙子兵法》亦在其中。汉成帝时，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待医李柱国校方技，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”此次整理书籍重点在文字内容方面。任宏校勘兵书的文字，刘向则统一其篇名，排定其篇章次序，确定书名，撰写叙录，缮写定本，上奏皇帝，然后由国家收藏。上述刘向、任宏整理兵书事，在银雀山汉简中是有所印证的。汉简本《孙子兵法》至少早于刘向、任宏整理校勘兵

书一百余年,还保持着不少早期形态,与定本有明显区别。例如:篇名有所不同,篇次有所不同,没有书名等。今天传世本《孙子兵法》的书名、篇名、篇次应当是刘向、任宏时排定的。他们确定的书名应即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吴孙子兵法》,这也就是后代称孙武书为《孙子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的由来。汉代收集整理兵书对《孙子兵法》的保存与传世有很重要的作用。

东汉末,曹操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,所用底本为三卷本,阮孝绪《七录》亦三卷本,看来曹操所注当是刘向、任宏整理校勘的本子,即国家收藏的定本。曹操注释《孙子兵法》在序文中称“略解”,曹注本是传世的最早的注释本。曹操很推崇孙武及其兵法,其序曰:“吾观兵书战策多矣,孙武所著深矣。”曹操注《孙子兵法》缘起于“世人未之深亮训说,况文烦富,行于世者,失其旨要。”曹操此说甚是,自春秋晚期到东汉末年已历六、七百年,其间社会制度经历了很大的变革,战争的规模、兵种、战术等都有变化发展,更为重要的是文字从六国文字演变为小篆、隶书。由于时代的变迁、文字的演变,人们为了解《孙子兵法》内容的真谛,势必要依靠注释的帮助。曹操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学知识、多年的战争经验,并且深通兵法,其注释《孙子兵法》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幸事。《孙子兵法》一书经曹操注释后,自然研读者多,传抄者众,从而更广泛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。唐宋时,唐太宗、李靖在兵法方面的造诣很深,经常研讨兵法。唐太宗说:“朕观诸兵法,无出孙武。”此时,注释《孙子兵法》者渐多。宋朝时,多次降诏校定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等兵书。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成为武学的必修科目,武举要考试“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六韬》大义。”(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)宋代为后世留下十分珍贵的孙子书有《魏武帝注孙子》、

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、《十一家注孙子》。唐宋时代官方重视,注释和翻刻弥多,《孙子兵法》一书广泛流传。

明清两代,明代较重视疏解,并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,如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》、赵本学《孙子书校解引类》较有代表性。清代偏重校勘,如孙星衍《孙子十家注》,对各家注文进行了考校,颇多可取之处。此书流传较广,影响也大。只是孙氏有心注《孙子兵法》而未能注,是为憾事。

《孙子兵法》一书成书于两千多年前,流传广泛,校注本也很多。1972年我主持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,出土了汉简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,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和孙臆各有其人,各有兵法传世。这次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,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重视和兴趣,推动了《孙子兵法》研究走向高潮。1989年全国性的学术团体“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”率先成立,带动和影响了国内外同类研究组织纷至沓来。同时,注释、研究、普及和应用《孙子兵法》的文章和书籍纷呈于世。这些著作数量多、内容多样,在质量上也大大超过前人。孙子之学蔚然而生,与儒学的研究交相辉映。今天研究《孙子兵法》的条件比前人优越许多,有些条件是前人所不具备的。我们能够继承历代研究的成果,吸取清代训诂学的成就,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新资料。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,在研究会的倡导和规划下,由我主编并与同好撰写了《孙子校释》一书,冀希能补历史之缺憾于万一。

我就是在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中得识黄朴民博士的,后在撰写《孙子校释》一书中,朴民亦是合著者之一。朴民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,尤其在儒学与兵学方面见长,著述丰厚,在中青年学者中位在前列。朴民笃实宽和,认真专注,在清苦

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勤恳耕耘,不为外务所动,于今尤为难能可贵。今与赵海军同志一起,对历史上最重要的《孙子兵法》集注本进行认真的点校整理,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,必将有益于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事业的发展,对弘扬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。故虽不善为文,却乐为此序,与朴民等共勉之。是为序。

吴九龙

1995年3月

《孙子》真伪、著录、版本及价值简论

《孙子》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内容博大精深，思想深邃富赡，逻辑缜密严谨，文采典雅绚丽，问世以来，对中国古典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为深远，被人们尊奉为“兵经”（《文心雕龙·程器》）、“百世谈兵之祖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）。直到今天，《孙子》的许多合理内核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泽，启迪着人们的智慧，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树和发展，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。与此同时，《孙子》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，还超越了军事领域，在商业竞争、企业管理、体育竞技、外交谈判等社会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。《孙子》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文化财富，它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，被译成英、法、俄、日、意、捷克、希腊、阿拉伯、越南、朝鲜、罗马尼亚、希伯来等 20 余种文字，学习、研究和应用《孙子》的热潮盛久不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部古老的兵书业已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具有不朽的魅力。

那么，《孙子》究竟是怎样一部兵书？它的作者是何人？成书年代在何时？它为何诞生于古老的东方大地？它的著录和版本情况怎样？它的理论特色和思想价值体现在何处？如何认识和把握其历史地位和影响？本着向读者介绍古典名著的宗旨，为大家阅读和利用《孙子集注》一书提供帮助，我们谨

就上述问题作扼要的说明。

一、《孙子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

关于《孙子》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，学术界曾有分歧的意见，自宋代以来，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。论争的焦点，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？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臆？抑或如叶适所言，为某“山林处士”（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十六）？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：孙武的事迹不见于《左传》等先秦典籍的记载，《孙子》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、运动作战方式、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（如主、将军等）的称谓、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。因此，《孙子》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，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。它的作者也难以肯定是孙武，而当为其门人或再传弟子。有的学者则更断言为战国中期的孙臆。

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，其中有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。0233号汉简上书“吴王问孙子曰……”；0108号汉简上书“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……”。两种兵法同墓出土，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《史记》等史籍关于孙武、孙臆的记载相吻合，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、孙臆各有其人，《孙子》的作者不是孙臆。肯定论者据此认为《孙子》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“千年聚讼”已“一朝得释”。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，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，他们依旧坚持《孙子》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（参见李零《关于银雀山简本〈孙子〉研究的商榷》，载《文史》第7辑；郑良树《论〈孙子〉的作成时代》，收入《竹简帛书论文集》等文）。

我们认为,《孙子》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,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。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:

第一,孙武撰著《孙子》见于《史记》的明确记载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云:“孙子武者,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:子之十三篇,吾尽观之矣。”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:1、孙武曾著有兵法,并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。2、“十三篇”篇数与今传本《孙子》篇数相符。这是孙武著有《孙子》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:“白圭,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,李克(悝)务尽地力,而白圭乐观时变……故曰:吾治生产,犹伊尹、吕尚之谋,孙、吴用兵,商鞅行法是也。”白圭是战国前期人,他这里提到的“孙”,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臆,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云:“吴有孙武,齐有孙臆,魏有吴起,秦有商鞅,皆禽敌立胜,垂著篇籍。”又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云:“阖庐之教,孙、吴之兵,不能当矣。”高诱注:“孙、吴,吴起、孙武也。吴王阖庐之将也,《兵法》五千言是也。”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,并著有兵法。高诱更肯定《孙子》凡五千言,与今传本字数相近。其他如《韩非子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论衡》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。这些情况表明,孙武善用兵,撰著兵书乃是战国、秦汉时人们的普遍共识。

又,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孙子佚文·见吴王》及青海《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》均曾提到“十三篇”(“十三扁”),且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孙子》之内容与传世本《孙子》内容基本相一致。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。

第二，叶适、全祖望、陈振孙、钱穆、黄云眉诸人以《左传》不载孙武事迹，而断言孙武非《孙子》作者，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臆为一人，或以为《孙子》成书于孙臆之手，凡是种种，多属猜测之辞。因为仅凭藉《左传》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《孙子》的关系，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。这一点宋濂《诸子辨》中即有反驳。其要云：“春秋时，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，不然则否。二百四十年间，大国若秦、楚，小国若越、燕，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，何独武哉？”至于混淆孙武、孙臆为一人，或言孙臆作《孙子》，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，毋需赘说。

第三，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、作战方式、文体特征考论《孙子》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，进而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，孙武非其书作者。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。首先，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，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，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“军礼”传统一脉相承；而自晚期起，则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，战争规模扩大，作战方式改变。仅就作战样式言，即是示形动敌、避实击虚、奇正相生等“诡诈”战法开始流行，过去那种“约日定地”、“鸣鼓而战”、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。用班固的话，便是“自春秋至于战国，出奇设伏，变诈之兵并作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《孙子》与“古王者《司马法》”不同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。其次，在这一时代变革中，南方地区的吴、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。当时这些较少受旧“军礼”传统束缚的国家，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、突袭、诱敌等“诡诈”战法，并经常奏效。孙武曾在吴国为将，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，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（包括战法）的特点。所谓“孙氏之道，

明之吴越，言之于齐”（《孙膑兵法·陈忌问垒》）指的就是这层含义。所以，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、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划上等号，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。

第四，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孙子》书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。如其言“合军聚众”，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。其言“穷寇勿迫”，其实就是早期战争“不穷不能”、“战不逐奔”的翻版。而其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全胜观念，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。众所周知，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，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，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。换言之，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，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，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，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。于是，会盟、“行成”与“平”，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。公元前 770 年，屈原率楚军大败绞师，结城下之盟而退还；公元前 612 年，晋攻蔡，入蔡，为城下之盟而退师。公元前 571 年，晋、宋、卫三国之师攻郑。冬，城虎牢，逼迫郑国求和；等等，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。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，遂构成《孙子》兵学的理想境界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，言“仁”而未尝“仁义”并称以及“舍事而言理”的论述风格，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。种种情况表明，《孙子》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，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否认《孙子》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。如其“五行”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；“焚舟破釜”等句颇可

怀疑系后人窜入；而《用间篇》最后一段言“昔殷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”云云，也与全书“舍事而言理”的基本风格相悖。然而所有这一切，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《孙子》作者，其书成书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。

二、《孙子》的著录、流传及版本

1、关于《孙子》的著录与流传

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，《孙子》一书最早见于《史记》载述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云：“世俗所称师旅，皆道孙子十三篇。”可见当时称是书为“十三篇”。此后，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。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：

西汉时期是《孙子》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，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。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。第一次是汉初“韩信申兵法”、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）。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，“军政杨仆摭摭遗逸，纪奏兵录”（同上）。颜师古注云：“摭摭，谓拾取之。”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，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序》）。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，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《孙子》一书。尤其是第三次，它对于传世本《孙子》篇名、篇次的排定，内容的厘正，文字的校定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次校书之事，由刘向总其成。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，附于其书之中，上奏皇帝。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。根据其这一性质，我们可以推断《叙录》是古代目录书中

著录《孙子》的第一部。刘向卒后,其子刘歆继承父业,“总括群书,撮其指要,著为《七略》”(《隋书·经籍志》)。因此,《七略》也当著录有《孙子》。同时,需指出的是,经过刘向、任宏的校书,《孙子》遂形成定本,并由国家收藏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源于刘歆《七略》,其对《孙子》有明确之著录,“《吴孙子兵法》82篇图九卷”,称“吴孙子”是为了有别于“齐孙子(孙臆)”。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“十三篇”(包括汉简本的提法)增至82篇,且附有图卷,原因不外乎二: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百余年间,人们对《孙子》不断增益的结果,使其篇数大大膨胀。二是因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。我们认为,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。故三国年间曹操注《孙子》,即指明宗旨:“世人未之深亮训说,况文烦富,行于世者失其旨要,故撰为《略解》焉”(《孙子注·序》)。汲汲于恢复《孙子》之原貌。

曹操之《孙子注》,系现存世的《孙子》最早注释本。其注简明切要,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,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。其注为三卷十三篇,正与阮孝绪《七略》著录《孙子》三卷相契合,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《孙子》十三篇作注,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。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“十三篇”才是《孙子》的主体。曹操注《孙子》后,有《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》,不知何人注本,日人香川默识《西域考古图谱》曾予收录。需附带指出的是,在两汉、魏晋南北朝期间,人们通常以“兵法”来特指《孙子》这部兵书。其正式命名为《孙子兵法》当属隋、唐以后之事。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、李善《文选》注均称引“《孙子兵法》”,即是明证。《隋书·经籍志三》著录有“《孙子兵法》二卷,吴将孙武撰,

魏武帝注，梁三卷”，“《孙子兵法》一卷，魏武、王凌集解”，“《孙武兵经》二卷，张子尚注”，等等。还提到了孟氏、沈友诸人注释解诂。由此可见，《孙子》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。但从其篇幅看（少则一卷，多则二卷），当未尝逾越“十三篇”的范围，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。

唐代以降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，印刷技术的进步，《孙子》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人们对《孙子》的尊崇有增无减，习学《孙子》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。注家蜂起，各种单注本、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。尤其是在宋代，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，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，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，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于军事领域，提倡研读兵书，探求富国强兵之道。北宋神宗元丰年间，正式将《六韬》、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唐李问对》诸书勒为一编，号曰《武经七书》，颁行于武学，为将校所必读。《孙子》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。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、清而不变，如清代“武试默经”，依然是“不出孙、吴二种”（《武经七书汇解·吴子序》）。

与此相应，对《孙子》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等“正史”，以及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公私目录书，对《孙子》的各种版本、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唐宋以来，为《孙子》作注者不下于二百余家，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。其中著名的注家，在隋唐时期有孟氏、李筌、陈皞、贾林、杜佑、杜牧等；在宋代有张预、梅尧臣、王皙、施子美、何延

锡、郑友贤等；在明代有赵本学、刘寅、李贽、黄献臣等；在清代则有邓廷罗、顾福棠、朱墉、黄巩等。可谓名家辈出，蔚为大观。

2、关于《孙子》的主要版本

《孙子》书版本繁富，流传甚广，但穷本溯源，不外乎三大系统：1、竹简本；2、武经本；3、十一家注本。

180 竹简本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《孙子兵法》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《孙子》最早手抄本。据专家研究，汉简本《孙子》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(公元前140年)到元狩五年(公元前118年)之间。从字体风格来看，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，较历史上早期著录《孙子》的《史记》要早数十到上百年。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，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。我们认为，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《孙子》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，但却不尽全面。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，但终究并非完璧。且刘向、任宏诸人校书，乃是综合勘比众多《孙子》古抄本，多方徵考，择善而从，而成定本的，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汉简本可资参考，然不宜过于迷信。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，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【壹】·孙子》。

武经本 即指宋刻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。《武经七书》最早著录在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中，称之为《七书》，后因“武举以七书试士，谓之武经。”(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二《李卫公问对》题解)宋本《武经七书·孙子》，是现存《孙子》的最重要的版本之一，原为陆氏甬宋楼藏书，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，收藏在静嘉堂。今有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本。自宋代至明末清初，《孙